



IJ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ASS 日本研究所

“登峰战略”系列研究成果

JAPAN'S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 HEISEI PERIOD

平成时期日本的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白如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JAPAN'S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 HEISEI PERIOD

平成时期日本的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白如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成时期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 白如纯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201 - 2307 - 5

I. ①平… II. ①白…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 - 国际合
作 - 日本、东亚 - 研究 - 现代 IV. ①F131.35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7956 号

平成时期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著 者 / 白如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学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307 - 5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日本平成时期（1989～2018）的30年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989年日本平成（明仁）天皇即位之时，正值冷战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局面得到缓和的历史转折时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睦邻友好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政策选择和民心所向。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并行不悖的潮流，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获得了整合、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涵盖了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诸国与诸经济体，即东北亚的中国（包括港澳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东盟（ASEAN）10国。2005年东亚峰会启动以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成为新成员。与欧洲、北美等地区的区域合作相比，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1967年成立的东盟，在很长时间内是东亚地区唯一的政府级地区经济合作机制。

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东亚各国的贸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为：（1）各有关国家的地区主义意识普遍增强，地区认同正在逐渐形成，有关建立“东亚经济圈”“东亚共同体”“亚太自贸区”等概念与构想相继涌现；（2）地区国家对地区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态度，成为地区合作的根本保证；（3）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迅速，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双边合作机制相继启动；（4）以东盟为平台的东亚系列峰会规划并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调整并取得新进展，“10+1”“10+3”等合作框架运作多年，在推动以东盟、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合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也为今后东亚新的合作框架的建立和推进打下了基础。

从东亚区域合作展开的脉络来看，日本一方面充当了独特而积极的角色，即凭借其经济大国的实力以及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特殊关系而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另一方面，由于日美同盟的限制及自身因素的束缚即自

身的定位问题始终未能很好解决，日本未能充分发挥这种“独特的纽带作用”，更多是作为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发挥作用。在日美同盟关系的限制下，对美国态度的过多考虑成为日本难以施展其独特作用的原因之一。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探讨区域合作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取得过一些成果，但日本在区域合作方面一直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当谈及区域经济合作时，日本言必称“美国”“亚太”，唯恐引起美国对日本是否有意主导东亚的疑虑。

同样是在平成时期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国内出现了关于日本是否应该“脱美入亚”的辩论。这也是一场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改变以日美“双边主义”为根基的对外政策而支持“地区主义”的辩论。但辩论的结果显示，日本仍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轴，并希望能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尽管民主党执政初期力推“东亚共同体”，一度呈现“脱美入亚”势头，但美国的紧箍咒作用依然有效，号称实现“历史性政权更迭”的民主党黯然退场。安倍晋三二次执政后，着力拉近与东盟国家关系，积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浓重的亲美色彩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特朗普执政白宫后兑现竞选承诺，宣布退出一度热炒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即便如此，在经历短暂的挫折之后，日本一方面期待美国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另一方面则自扛大旗，力图在这个新的跨太平洋贸易自由化协议方面占据领导地位，以抗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势头。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也日趋积极和成熟，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现出坚定的信心。中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地配合东盟发挥作用。东盟作为共同体已经从与中国的商业贸易拓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近十余年中，中国与东盟关系几乎每年都有一项以上的重要进展。由于中国多年来持续不断地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尤其是近年来力主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及评价越来越正面，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东盟如今把中国而不再是日本视为带动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因而中国在日本对东盟政策中所占的位置也自然大幅提升。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东盟

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了这一覆盖 16 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程。2015 年 11 月 21 日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发言时强调区域经济融合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也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指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力争 2016 年结束 RCEP 谈判，努力建成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2015 年末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又出现了新的契机。

2017 年 11 月 14 日，在马尼拉举行了 RCEP 磋商开始 5 年多来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在谈判中，尽管要求在较高程度上撤销关税和制定贸易规则的日本及澳大利亚等国与希望保护本国产业的印度等国之间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则强调 RCEP 有助于经济一体化和实现包容性增长，敦促各国代表加紧磋商以早日达成协议。这表明本区域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合作，逆全球化思维难以阻挡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合作应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促进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尊重社会制度和文化多样化与多元化的合作。东亚合作应坚持开放性，欢迎域外国家和组织参与，致力于共同构建一个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利、安全上互济、文化上互鉴的和谐东亚。

回顾区域合作历程，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基本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引领区域合作，而是由地区内主要国家共同发挥核心作用。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指出：“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欧洲联盟的德国和法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日两国都有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并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中日两大国通过协调相互关系，将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研究应用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从回顾战后日本地区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日本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入手，梳理平成时期即 20 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变化；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与实践的分析，总结其政策变化的历史背景、制约因素、战略意图；根据经济与外交目标的实现程度，对日本

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做出评价。

本书由绪论、本论与结论三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是对本研究内容的总体概括。包括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本研究的创新点等。

本论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对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做理论阐释，借鉴并总结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研究、探讨的基础理论：相互依存（依赖）理论、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的区域合作理论、国际合作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等。

二是通过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情况的介绍，比较欧洲、北美洲以及东亚的地区主义的区别。尽管日本地区主义成为新东亚地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具有日本独自の个性特征。

三是论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型。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一直影响至今。

四是选取日本区域合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几个案例，总结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的特点。

结论部分对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与实施效果做出评价。通过日本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及今后将会影响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相关问题做前景分析，并概述了本研究主要学术观点，笔者对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研究的体会以及今后需要继续关注的课题。

笔者认为：危机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是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政策调整、变化的主要促进因素。进入平成时期以来，对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危机”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97年后半年发端于泰国、之后波及整个东南亚和亚太多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该危机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也是日本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契机。

第二次是2009年前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显示美

国主导世界能力的衰落趋势，以及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这两个趋势是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因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方经济实力的对比以及国际情势变化再度调整的重要动因。

第三次危机在表象上也许不是世界经济或者区域经济的因素所致，更多是基于日本民族特有的“危机意识”，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冲击如退出 TPP 等，直接给希望联美抑中的日本执政当局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制约未来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是日美同盟关系的走势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调整，中日和解、合作并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是理想的选择。鉴于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以及东北亚地区互信的缺失，包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内的地区一体化将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进程。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日本探索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早	002
第二节 日本因素影响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	010
第一章 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013
第一节 相互依存(依赖)理论	013
第二节 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理论	018
第三节 建构主义区域经济合作理论	022
第四节 国际合作与政治经济学理论	024
第二章 区域经济合作在东亚的发展	026
第一节 地区主义在东亚的产生与发展	026
第二节 欧、美、亚地区主义的比较	031
第三节 日本型地区主义的特点	039
第三章 日本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点与目标	044
第一节 日本东亚合作政策的起步	044
第二节 在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外交探索	046
第三节 寻求安全战略与区域合作的平衡	050
第四节 追随美国与主导区域合作的抉择	053
第五节 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政策调整的分水岭	054

第四章 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	079
第一节 “亚洲货币基金构想”与“新宫泽计划”	079
第二节 日新自由贸易协定与东亚经济伙伴协定	081
第三节 自民党“战略互惠”与民主党“回归亚洲”	086
第四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日本的应对	098
第五节 缅甸成为日本东亚经济合作新抓手	109
第六节 日本围绕“东盟共同体”展开的新攻势	122
第五章 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评价与展望	134
第一节 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效果	134
第二节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不确定因素	147
第三节 区域经济合作面临契机与挑战	162
参考文献	173
附录 日本与东南亚主要国家 EPA 交涉过程	186
后记	190

绪 论

东亚区域合作肇端于区域经济合作，因而区域合作问题首先体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议题。东亚地区主义和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20世纪后半期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的地区主义新尝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合作成为东亚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维护本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定的重要平台。东亚各国及地区组织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与地区政治经济形势，逐步转变观念，加强联系与沟通，积极调整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与外交政策，共同融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潮流。

研究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与实践，离不开对东亚地区主义形成、演变过程以及目前状况的理解与把握。而地区主义特别是新地区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形成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实践探索的基础和前提。关于地区主义的理论研究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间形成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地区主义实践也扩展到了世界各地。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冷战背景，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前景黯淡，因而相关研究自然不能得到深化。

美苏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平成时期，东亚地区主义获得发展契机，日本有关地区主义的理论研究也突破了基本上以欧洲一体化为主要对象的局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在地区主义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改变了以往主要由美、英等发达国家学者以欧共体为研究指标的局限。关于东亚地区主义、新东亚地区主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研究一度成为关注的热点。本书关于平成时期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梳理和探讨，是在借鉴先学对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以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策制定、调整，日本在区域合作各阶段的具体措施等相关问题为视角，即理论基础、政策选择、实践经验几个方面做归纳分析。

第一节 日本探索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早

鉴于战后日本的特殊身份,长期以来,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国际背景之下,日本遵循“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的外交三原则,这三个外交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侧重。决定与实施地区合作政策的关键是日本将区域经济合作置于外交全局的何种位置,以及如何把握日本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

一 日本政府层面对区域合作的态度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日本较早进行了探索性实践。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就提出过建立“泛太平洋合作”、“亚洲经济合作机构”和“太平洋自由贸易圈”、“东亚自由贸易圈”、“环日本海开发”等设想。冷战结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重新认识到东亚地区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性,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力量。同时,东亚各国也普遍意识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关于地区主义的研究得到重视,陆续展开了各层面的区域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先行者,加之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特殊身份,其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为东亚各国所关注。

1989年成立、1993年首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领导人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的首脑聚集在一起,构成东亚国家与太平洋国家合作的重要框架。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实际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提出,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为促进东亚国家合作,抗衡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提议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但遭到美国反对。随后,东盟国家又提出集团化概念相对淡化的“东亚经济论坛”,仍被美国视为一个分割太平洋的构想,并予以否决。而日本当时正与美国发生激烈的贸易摩擦,担心日美关系恶化,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由于新加坡等国担心影响与美国的关系,该构想在东盟内部也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但此后,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94年提议、1996年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以另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国家的合作。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东南亚,

照例提议举办东盟和日本首脑会晤。东盟担心引起其他国家猜忌，提议邀请中国与韩国的首脑共同参加，得到日本同意，真正的东亚合作机制随之诞生。1997年年中，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多数东南亚国家，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中国表示不会令人民币贬值，以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相反，美国没有帮助泰国，而且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引起东南亚国家愤慨，更加激发了它们促进东亚合作的决心。1998年金融危机在东南亚深化，东盟国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日、韩的合作，以摆脱金融危机。接替桥本龙太郎的日本新首相小渊惠三对“10+3”提案表示支持，中国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地区多边合作。1998年第二届“10+3”首脑会议召开，并自此确定为定期会议。1999年第三届“10+3”会议发表了正式文件《有关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从2000年开始，与会各方转入具体领域的合作。

进入平成时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7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东盟峰会、东盟“10+3”（中日韩）首脑会议、“10+1”首脑会谈以及东亚峰会等走向机制化。2016年9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东亚峰会，连同东南亚系列首脑会议及高级别论坛，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尽管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起步较早，也在不同阶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但从总体上看，日本对区域合作的态度并非一贯积极，呈现忽冷忽热的矛盾状态。这与日本战后独特的国家身份、东亚地区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东亚地区多样性的文化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日本在地区认同方面的摇摆与游移，即没有解决好“日美同盟”与“亚洲一员”的平衡问题。

日本起初对东亚区域合作态度消极的更主要原因是战后以来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一直以全球化为依托，且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对象。日本企业在欧美的投资回报率更高，风险系数更小，因而对推动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也更为积极。即便是面向地区的合作，日本也一直以“亚太”或“亚洲”为主要概念，似乎很忌讳论及“东亚”。初期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所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对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态度发生显著变化的分水岭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美、日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消长。美国对危机袖手旁观的态度激起了东亚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强烈不满，使其在东亚地

区的声誉和影响力下降。相反,日本推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和“新宫泽计划”,并对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给予紧急援助。尽管日本的援助行动“雷声大、雨点小”,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东亚国家对日本领导区域经济合作的疑虑。随着日本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其感到东南亚国家出现了希望由日本而非美国来领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

另外,由于金融危机削弱了东亚的经济实力,似乎不再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加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衰退并持续萧条,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霸权的野心有所收敛,使得美国能够适度“松绑”,允许日本试图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总之,美国既不愿意东亚经济过分强大,与欧美分庭抗礼,对其构成威胁;也不愿意东亚经济过于衰弱,使其得不到利益。亚洲金融危机正好给了日本在美国默许下对东亚区域合作施加影响力的绝佳机会。^①

日本东亚合作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东盟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迅速。在2001年的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期间,双方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一致意见。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

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改善与发展之迅速,显然大大超出了日本方面的意料。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并于2003年10月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构成对日本以竞争方式来谋求地区主导权意图的挑战。

日本决策层深感来自中国的压力,加紧了对其传统势力范围东盟的外交攻势。2002年1月,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盟,在新加坡发表了题为《东亚中的日本和东盟——寻求坦诚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小泉首相在演讲中,不仅提出了要建立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还提出了建设“并行共进共同体”的主张,并为这个共同体定下基调:以日本和东盟的合作

^① 陆建人:《日本区域合作政策》,《当代亚太》2006年第6期,第14~18页。

关系为基础再行扩展。^① 该设想的出台，显然是急于要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争得主导权。

2003年12月，首届“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齐聚域外举办首脑会议，日本朝野高度重视并引以为豪。这次特别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东京宣言》及《行动计划》。宣言呼吁与会国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日本提议在宣言中写入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日本在此次首脑会议上也签署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05年8月，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明确提出了日本推动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原则。在名为《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该评议会认为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必须以增加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并具体列举了“安全保障”、“繁荣”、“价值”这三个关键词。在“安全保障”方面，设想建立一个作为“不战共同体”的“东亚共同体”，但其前提应是坚持日美同盟。在“繁荣”中，提出“为了日本经济的成长，要创建一个人员、货物、资金、信息都能自由且灵活进出的环境，与成长潜力巨大的该地区建立密切的关系”，提出实现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② 在“价值观”方面，长期逐步形成的东亚共同体必须符合日本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具体地说，自由和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制等价值在东亚共同体中也必须得到实现。^③

2005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看法》，明确阐明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即“开放的地区主义”、“以促进功能性合作为中心”和“尊重一般价值、遵守全球规则”。2006年4月初，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提出了建设“东亚经济伙伴协定构想(EPA)”，主张自2008年起的10年内，通过与东盟、中、韩及澳、新、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全面签订经济伙伴协定，建立日本主导的超越东亚范围的经

① 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拉入由日本与东盟为基础的共同体即为小泉首相当时的提议。

② 政策報告書：「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の現状、背景と日本の国家戦略」、東アジア共同体評議会2005年8月，<http://www/ceac.jp/>。

③ 〔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战略》，《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6期，第3页。

济伙伴协定。^① 日本政府曾强调东亚合作不能成为一个排他性机制，在结构上应该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并大力推动“10+6”模式，希望东亚共同体不仅包括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核心成员，还应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参加，并试图把美国拉入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日本主导下的“开放的东亚共同体”，这样既可以缓解美国对日本经营东亚共同体的疑虑，又能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介入，增加日本在共同体中的分量以稀释中国的存在感。

2012年东盟提出“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倡议，2015年末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东盟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实力进一步增强。面对东盟壮大和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日本加紧在地区外交领域的布局，以争夺区域合作的主导权。2013年12月安倍现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利用东亚峰会、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谈(10+1)以及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谈(“10+3”)为平台，加大首脑外交的力度，希望扩大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在双边层面，以“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协定(JSEPA)”为模式，积极发展与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的双边经济合作。在东北亚，日本曾倡议成立日韩自由贸易区，企图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到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由其主导的东北亚经济圈。日本在各种场合，强调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要建立在与区域外国家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并充分照顾到美国等其他区域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二 日本学界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认知

日本学者关于区域合作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过程、日本学界对区域合作政策的理论探讨、政官学各界对该问题的不同见解与争论以及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制约因素等。尽管对诸领域已多有研究，但联系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发展，做出全面深层次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实现。同时，日本学界以及国外其他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研究也存在与中国国内研究相似的情况。正因为日本是最早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探讨的国家，所以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但鉴于东亚地区主义起步较晚，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开展初期，国内对该领域的介绍相对不多或不够全面。

① 宋国有：《试析日本的东亚地区秩序战略》，《国际论坛》2007年第6期，第61~65页。

日本学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存在不同的见解与主张。研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日本著名学者、立命馆大学西口清胜教授总结了日本对于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即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几种主要见解：一是重新审视日美同盟基轴论，主张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在中日和解与合作基础上，构筑东亚共同体，代表人物是岩手大学校长、曾任OECD事务局次长的谷口诚教授。二是坚持日美基轴论。认为由于中日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不同，中日联手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存在困难与不现实性。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日韩三国政治见解各异，已成为阻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因素。同时该见解认为，中国有意通过区域合作谋求地区霸权，代表人物为日本拓殖大学校长、经济学家渡边利夫教授，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田山襄以及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等。三是相对“中庸”的见解，认为既要坚持传统的日美同盟，又要加强与国际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日本前首相、著名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为会长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发表的政策报告中，阐述了日本的战略原则以及日本的基本理念。支持该见解的日本学界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田中明彦教授及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教授等。^①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从中、日、美三国互动的角度出发，曾经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做了两种推演。第一种推演是所谓“零和”游戏型的地区权力政治。认为无论“中国崛起”，还是北美（NAFTA）+欧盟（EU）+东亚共同体（EAC）三个区域中心的结构，本质上都会对美、日甚至亚太地区秩序产生威胁。因此，美国和日本都期待东亚共同体能够成为一个牵制中国的组织；中国自然也相当清楚美日的这些猜疑。在同样的考量下，中国对于日美同盟的安全防卫体制也倍感威胁。第二种可能是，接受“零和”政治的现实，认识到现今潮流就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新东亚秩序”才是重要的议题，因此现在的“东亚共同体”也要放在这样的现实中来理解。经济上的趋势已经越来越走向相互依存的结构。然而，在安全防卫上，除了现有的如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日中印等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外，诸如反恐、能源、粮食、环境等生活空间的安全保障也都需要缔结新的合作机制。中国从不讳言“美国的威胁”，

^① 《西口清胜教授退職纪念讲义》，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主办，2010年1月14日。